

# 浅述七十年代以来 华人政治论述流变

潘永强 • 新纪元学院讲师  
(Phoon Wing Keong • Lecturer, New Era College)

华社研究中心是在 1985 年成立，它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华人政治在“抗议”与“自强”的双重变奏下衍生之产物，华研的背景与处境，与华人政治的论述演变，实有不可切割的关系。事实上，社会任何集体的行动与政治动员，都不可能忽略话语或论述对群众思潮所起的影响作用，20 年来，随着华人政治的论述与思潮出现不少变化，华研的角色也历经几度调整。如今恰逢华研成立 20 周年，本短文将尝试整理 1970 年代以来，华人政治过程中浮现的主要论述，并对此流变作一初探。

## 一、何谓论述

“论述” (discourse) 从字义上可翻译成“话语系统”、“论证”、“陈述”、“讨论”等，但在牛津英语辞典 (OED) 的解释，英文的 discourse 与法文 diocours 均来自拉丁文的 discursus，其字根 discurs 则来自 discurrere，其意为 running hither and thither，也就是来回跑

动的意思。人类透过言谈针对设定之议题达成沟通，在过程中运用语言往返完成相互了解，因此针对某一主题，做出相当篇幅讨论的对话或文字作品，可称之为论述。

在现代阐述“论述”最精彩详尽的应属法国哲学家傅柯 (Michel Foucault 1926-84)。其对“论述”的定义是：“一种陈述系统，也就是使社会的现实世界可为世人所了解、应用与运作，并进一步形成主体与客体间的权力关系；藉由复杂的符号与实践，得以组织社会存在，使文化具有再复制的可能；其基本规则是透过分类机制、权力关系与知识系统来具体操作。”故论述是有权威性、操控性，目的在巩固权力的；决定哪些才是“正确的知识”。论述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意图支配他人、建构制式知识且排他性极强的“真理意志”，并经此完成“主体位置”与“权力意志”，以便创造惩戒的“规训”。

因此，可将“论述”界定为“一种非正式的约束与指引，它规定了事物是什么，以及该怎样去谈论它”。要注意

的是，论述所具有的指导性与约束性，这二个功能合起来，就赋予了那些合于论述的人、事、物具有所谓的“正当性”（legitimate）的存在。

至于政治论述的价值，诚如台湾学者钱永祥所言，一般来说，一个社会在特定的发展阶段，相应于它所面对的内外环境，会形成某种特定的政治论述，一则藉以澄清它所必须处理的政治问题，二则藉以凝聚关于政治价值的共识。这种论述的发展与演变、积累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政治集体意识的历史，对于其成员的自我认知与迈步方向有相当的影响。因此，“看看什么论述特别突出、什么论述又淹没不彰，可以揭露这个社会集体意识的内容与结构。”

大马华人社会面对 70 年代以来，马来人政治支配地位的升高，以及国家机关的扩权膨胀，无论是华人政治的领导菁英，抑或华社民间力量，都必须提出应对的思考，也需要透过政治论述来传达自己的主张、理念和使命，争取更多群众的认同和支持。就此而言，华人政治论述能力的创意和格局，就攸关华社政治诉求的兴衰荣枯。

## 二、政治论述的两大传统

我国独立以后，华人政治的政治论述，其实可归结为两大传统，一是社会主义，二是族群自救，大部份在华社居主流地位的政治论述，大都不出这两大传统。虽然曾经有一支微弱的保守主义论述，但不成气候，已经褪色。然而，我国华人政治一直缺乏另一个在近代西方影响巨大的思想资源，即自由主义的理论传统，即使有，也不过是粗浅和单

薄的民主概念。

社会主义的论述传统，曾经是华人政治中一支激情奔腾的大旋律，自独立前后一直到 70 年代中后期，它在华人政治中都享有巨大的动员影响与精神魅力。这一股社会主义论述，无论在中、英文源流的华人政治思潮中，都有拥护者，也曾经有过深广的群众基础。

这个论述传统，伴随着二战之后全球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，以及独立建国运动，在冷战结构下成长。它强调反帝反殖、阶级平等、工农权益、民族团结，不强调狭窄的族群意识，在意识形态对峙的年代，有极强的感染力。由于独立初期社会的普遍贫穷、阶级剥削、族群矛盾，加上威权政体的反共反左倾向，令社会主义论述在劳工阶级、青年学生、城镇小资产阶级当中，颇受认同。在七十年代之前，华人政治中支撑着社会主义论述的政治载体，除了地下的马共组织，尚包括合法的劳工党、工会团体、文艺团体，即使是非华人领导的温和左翼政党人民进步党，也在一些城镇取得华人支持。

但是，我国华人政治中的社会主义论述，作为一股反叛和抗议的批判力量，反而远比提供知识上与理论上的思想资源，来得更有影响。这股华文左翼传统，其思想来源颇为复杂、零碎与紊乱，在反共和冷战的思想封禁环境下，本土的左翼政治活动家，甚至是知识分子，其实无法有系统地承袭或学习社会主义的知识传统。因此，本土华文左翼的观念传播路径，并非是透过知识分子先从学术概念中引介，然后再行阐扬散播，反而大多是通过政治动员中片断与含糊的转述和宣传，吸取养份。其结果是，他们掌握到的不一定是明朗、系统

的概念架构，多是一些实践意味浓厚的战斗策略，因此与欧陆的社会主义源头，可说是存有断裂的，既无法援引也难以理解 60 年代以来欧陆社会主义思想阵营的种种讨论和反省。

其实，这股论述的思想资源大部份取材自中共政治的二手转述，而且充斥许多毛泽东诠释下的群众革命式语汇和修辞，无论是思想深度或语言质感，都略嫌粗糙与浮躁，这为本土华文左翼论述留下深刻烙印。这股论述传统有许多理想性的想象，也流露坚毅的意志，可惜却缺乏落实在本土意义上的深层、精致的政治经济分析，以致略为单薄而无以为继，殊为可惜。60 年代中后期，这股论述力量走上乌托邦式的激进化道路，加上国家机关的强力镇压，最后走向式微。无论如何，左翼论述对文字的思考极度认真与在乎，它也为反压迫的抗争运动提供诸多精神能量，过去曾为华人政治在思潮与实践上作出过重大贡献；其风尚与遗产，后来仍深深影响着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华裔政党与华团政治。

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华人政治论述场域上，尚有一支力量能与社会主义论述阵营交锋，那就是保守主义论述。在西方政治光谱，保守主义维护自由与秩序，因不偏向激烈改变社会现状，而位居右翼行列，但绝不等于反动、威权和落伍的意思。由于英国治下的传统，华人政治论述中也承受了一丝微弱和模糊的保守主义论述，以早期陈祯禄、陈修信为首的马华公会为代表。

马华公会初创时，集结了华人政治上保守、右翼与民族主义人士，与左翼势力相抗衡。在王赓武描述的华人政治的三大类别中，存有保守主义倾向其实

概括了多数。在陈氏父子的政治观念里，他们了解到多元族群共同建国，应有所取也有所退让，以保留协商共存的空间。他们维护民主宪政与议会政治，强调社会契约下的现状不应受破坏。但是，纯真的保守主义却难以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生根，马华公会在国民整合和认同危机的交合煎熬下，毫无应对变革之能力，在马来人种族支配意识不断上升之下，华人政治论述中的老式保守主义只好在褪色中退场。70 年代后马华公会迷途失航，在剧变的族群论述中身陷两难困境，从而丧失中道地位，虽然近期重建社会基础，但纯粹依靠利益与物质交换，已缺乏论述的光彩与关怀。

反而，自 70 年代起，华人政治兴起另一股随后影响极大的政治论述，就是一连串族群自救的论述思考，最后在 80 年代达到高峰。族群自救论述一反过去的社会主义 / 华文左翼论述传统，重心从阶级平等转为族群平权，虽然主轴仍是诉诸平等，但主体已从阶级移位到族群身上，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意结，以及“自强”、“救亡”的意图。它自然是植根于大马国情中复杂的种族政治，以及五一三事件后华人政治面临的集体重创，以及种族压迫的焦虑。

在 70 年代初期，主张社会主义的左翼党团受到打压，正处于低潮，粗糙的左翼论述无法向上提升，难以解释现实的族群政治，而残弱的保守主义论述更是不合时宜。由于新经济政策、单元文化政策、种族固打制、工业协调法令等等，对华人社会带来深重的压力，导致华社穷于响应，自此华人政治中大多数的动员与集体行动，无不出自族群自救的论述，而论述的核心关怀，则以捍卫华人语言文化和发展华文教育为重中

之重。

这股论述的内容，起初都是一些简约而朴素的族群自强论调，仍缺乏具体的政策诉求，例如主张“华人要关心政治”、担心华人前途“何去何从”，表达华人“处于十字路口”的彷徨，要求“华人应寻求政治突破”，或是悲叹华社犹如“一盘散沙”，企图诉诸华人大团结，甚至期待出现“华人救星”、“经济奇才”。

由焦虑、涣散与不知所从，族群自强论述逐渐产生“自力更生、保障权益”的思路，因此就有了马华公会主张的集中小资金兴办大企业的构想，这种带有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一经提出，大获响应，结果马华公会走上政商合一，发展马化控股公司，各种华团合作社也如雨后春笋涌现。当年政论家许光道曾发出“马化会不会生金蛋？”的质问，但民族经济出路掩盖了一切理智与警惕。另一方面，随着独中复兴运动如火如荼地推广，申办独立大学重新被提起，结果也一呼百应，因政府拒绝批准，华社向政府提出诉讼，然而官司终告失败。

80年代初，族群自强论述有了进一步的转化与提升，就是走向政治化的途径，其思路是：“朝中有人好办事”，为此集结华社民间力量，试图介入政治，影响政府决策，这就有了“三结合”主张。首先是董教总派员参政，但打入国阵的举动，很快就证明此路不通。于是，族群的自强只好回到壮大民间力量的方向发展，此时华团扮演重大的行动角色，强调“超越政党，不超越政治”。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复兴运动、民权运动、主张两线制等等，皆是在族群自救的论述下不断寻路的历程，而族

群自救的途径，从文化、教育、延伸到经济和政党政治，层面广泛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时期的华团领袖和菁英，对族群自强和自救，并非全属口惠而毫无实干。在80年代轰动一时的文化复兴运动、民权运动，就不只是口号与诉求而已，其时华团菁英不只要要求行动，而且还有追求运动要“制度化”想法。例如，自全国华人文化大会之后，不只拟定国家文化备忘录，还首创文化节，并以各州轮办的方式进行，此外，还推动华团文化咨询委员会、筹募文化发展基金等工作。到了民权运动时期，则先是设置了华社资料与研究发展中心（按原来构想是要扮演华社策略研究的智囊角色，甚至计划在各州设立分部），透过华资，就集合了知识分子拟定《华团联合宣言》，再成立全国与州级的华团民权委员会，宣扬民权观念，以及提出两线政治的理念，等等。

在族群自救论述的激励下，80年代华社几乎建构出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又制度化的文教、政治的运动机制，也形成萌芽中大马公民社会的雏型。受同期气氛感染，由于保卫三保山事件，也令华人开始重视本身的历史书写，《马来西亚华人史》即在80年代编写完成。华裔大专生则掀起校园感时忧国的散文创作，大专华文文学奖和大专华语辩论赛也相继创办。那个年代尽管华社论述议题都是沉重又悲情，但社会力的朝气与活泼，却称得上是生龙活虎、龙马精神。

在这股族群自救的大论述之下，无论菁英与群众都共同思考华人前途与出路，结果有效凝聚和加强了华人身份认同与集体意识。因为在国家机关的政经文教压力下，只要是同一族群身份，不

分阶级、语文源流、意识形态背景，都同样认知和感受到一致的国家政策压力，因此华人社会尽管仍有不少内部的差异与分歧，竟然可以在族群自强的论述主调中，将差异模糊掉，反形成不少共识。不过，族群自救论述不一定得到其他族群或非华文源流菁英的完全谅解，例如英语论政团体“国民醒觉运动”（Aliran）的反对独立大学，或马大学者陈志明的坚持国民团结优先，彼此就有微妙的对峙与交锋。

任何论述的生命力，除了要能有效解释社会的现实情境，并提出可行的行动指引之外，它还要有相应的氛围，既要有外在气氛，也要萌生内在的感动，才能打动人们的心坎。80年代在威权体制长期的政经矛盾下，正好爆发了连串的社经事件，如合作社危机、华小高职事件、茅草行动等等，最终导致华团人士加入反对党，要促成两线制，这段经历令华人社会经历了一趟政治学教育的洗礼。

在族群自救的论述传统里，其中出现过一些较具格局的思考与观念，如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民权启蒙运动，以及壮大反对党的制衡观念。90年代中，随着国家机关的日益强大，知识界也试图以公民社会（civil society）的概念，予以抗衡响应。这些有关公民权利的主张，曾经产生过一些意义与影响，但未能深化和进一步拓展，我认为，这就跟大马华人社会缺少了自由主义的论述传统，颇有关系。

自五一三事变之后，大马民主政治一度走向空寂的旷野，此时，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公民自由与宪政民主等论述，大概只有林吉祥和国民醒觉运动的言论孤独上路。但是，一种理性、冷

静、有条理的自由主义论述，并未在华社形成主流的价值。过去在华文背景的读书人中，甚至还有“重鲁迅，轻胡适”的现象。于是，80年代的民权运动，只是一种族群面对忧患意识之下的紧急响应，但内心记挂的依然是族群权益自救，民权主张充其量只是论述外衣。

必须一提的是，尽管林吉祥先生个人的言论，流露许多自由主义的思绪与元素，甚多值得激赏之处，但他带领的民主行动党，作为8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反对力量，宣扬“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”，突显土著与非土著的分野，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华人政治的族群自救论述，起了一种呼应、配合甚至推波助澜的作用。由于论述上有契合之处，两者在80年代后期产生共鸣，就毫不令人意外。

无论如何，华人社会纵然对人权、民主、制衡等观念心向往之，但始终视其为争取公平合理的手段而已，如果这些理念未能得到深化和演绎，没有一种自由主义式的认同和觉悟，最终只会沦为简单的口号。即使在民权运动高潮的时期，华社的群众仍然缺乏现代公民意识，对怎样建构一个现代国家也未必有深刻体认，例如国家中立、依法行政、程序正义、政教分离、公领域与私领域的严格区分，都还没有清楚认识。当年的民权论述略嫌简约和单薄，若缺乏自由主义的土壤作为支撑，一旦华社“危机”解除，或被保守论述转移，就可以弃而不顾。

90年代初之后，当马哈迪政府重塑执政议程，调整施政论述之后，华人社会就被“小开放”、2020宏愿和“我们都是一家人”等官方论述成功收编，或

是如张景云先生所说的“招安”和“去政治化”。华人政治的自救论述面临一段盘整的阶段，也是自主性面对考验的时期。政府批准华总（前称堂联）成立，并扶持当局属意人选领导时，就形成裂解华社的公民社会生机，一时之间“协商政治论”甚嚣尘上，族群自救的论述因而渐告失效，尽管制度面的问题没有太大改变。

9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，国家经济增长稳定，马哈迪政府又好大喜功，似乎国人皆处于歌舞升平之中。由于经济政策自由化，种族政治火焰稍懈，私立高等教育又相继开放，华人政经压力获得舒缓，甚至有的产生一股国家自豪感，如此一来，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的抗议与不满情绪，逐渐烟消云散。国家主导下的政治议程慢慢瓦解了华人政治的防卫心理，原有的社会共识与论述开始出现杂音，例如出现“协商”与“施压”的路线争议，同时华人政治也呈现涣散、迟疑、谨慎的态度。

直至90年代末金融风暴与安华事件，停滞的华人政治论述竟然无法理解骤然变色的政经波动，一度处于犹疑和不知所措状态。最后，在政治突变下，华团整合出一份大选诉求文件，向各党派作出呼吁，但并未整理出条理清晰的前瞻性论述，反显得步调凌乱。1999年大选后，〈华团大选诉求〉被秋后算帐，华人党团与社会菁英错乱不堪。2003年底阿都拉首相上台后，大马面对回教化与马来政治风潮，华人政治却沦为论述凋零的地步，仍得不断思考未来新变局，短期内似无能力厘清它所面对的政治问题，也迈不出凝聚政治共识的步伐。

### 三、论述的瓶颈与困境

回顾70及80年代以来的华人政治论述，它其实经历了一个由彷徨、涣散，到激情高峰阶段，尔后却倒退回今日所见的疲乏与虚弱的境况。从整个过程中，仍可粗略发现几项特点：

第一，当年的华人社会是基本“团结”的，纵有政治党派上的歧见，但在族群权益的大课题上，相当具备共识。也就是说，华社内部的凝聚力和互信程度相当高，因此华社内部的社会资本（social capital）是相对丰厚的，这有利于各种动员和行动。

但是，从80年代开始，华人政治论述基本上可算是一种政治诉求，甚至只是较狭窄的选举诉求，其目标有时是短期的，集中在影响大选结果，诉诸的对象是上层的政府/政党。如果大选结果不如人意，或相关诉求得不到回响，则论述可能就宣告式微，鼓吹和发动者也许就意兴阑珊，然后再行“寻找”新论述。如三结合打入国阵、两线制、华团大选诉求所历经的过程。其原因，有时是基于论述提出时估计过高，有时是可操作性不足，有时则是自信心缺乏，这在在都妨碍了论述的拓展与深化的机会，特别是在基层从事教育宣播的工作。

另外一项特点是，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两个10年，华社重要的政治论述与政治运动，大部分都是由董教总所发动，至少也是有董教总人士的积极参与。当时的董教总，几乎扮演了华人政治论述生产基地的角色，自然也成为华人政治的领导轴心之一。

但是，时过境迁，今日华人政治却出现论述疲软的困局。导致这种局面的

原因，自然跟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的剧变，令华人政治论述被有效的收编，大有关系。除了国家机关的滥权和壮大，以及党政人士的渗透介入这些众所周知的背景之外，这里主要想讨论一下华社内部的限制，及其产生的问题。

首先，90年代以来，华团和公民社会并非没有议题可以发挥，如延续之前的族群平等、民权、反贪污、媒体自由、华教发展等等。然而，这一连串议题却缺乏与时俱进的政治论述或改革论述的支撑，也无法作出系统性的整合和贯穿，进而提出清楚与完整的政策诉求和愿景视野，以激发出道德面的高度。这些议题，其本质全都是过去早就提倡的老议题，如果未赋予新意或强化其内涵，就令改革议题无法真正开展与落实，反而暴露出政治论述的陈旧与单薄。

可见，一套政治论述或其架构，在新出现时最能吸引人们注意，但随之而来，就须不断拓展论述架构的广度和深度，才能维系政治论述的生命力于不坠。倘若一套新出现的论述架构无法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所建树和突破，很快的就会沦为口号、教条以及口水之争，那么这套论述语言的生命力也将随之枯竭。

其次，80年代在华社族群自救论述中，出现过一阵民权意识的觉醒运动，今日评估似乎成果没有十分彰显，不只华社整体的民权与公民意识未有明显提升，华团本身对民主的权益与程序之认识，时常也是荒诞不经。部分原因，或可归咎于80年代华社菁英和知识分子所推动的“民权”，其实是族群意义下的民权概念，而非属于社会意义之下的民权概念。这两个概念取自学者钱永祥

的启发，他认为在族群意义下的民权，认为压迫与对抗来自族群外部，因此民权概念是用来对应外部压力的一个工具和利器。只有社会意义之下的民权概念，才有追求社会进步、取消公民权利不平等的终极关怀与价值。由于两个“民权”概念的歧异，80年代华人政治论述中证明了，族群意义下的民权遮盖过了社会意义之下的民权概念，令真正进步意义下的民权意识，并未在华人政治或华团生活中扎根，反而消解了民权启蒙运动应有的反抗与抗议内涵。

此外，论述再生产之所以产生瓶颈与困难，还与缺乏一个理性的对话情境有关。原来，大部分华人政治论述，都不是经由知识分子从公共刊物上讨论诞生，反而多是由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家提出。70年代和80年代，华文报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，激荡出论述的成形和辩论。可是今日，华文报已告沦陷，但华社竟然连一份讨论公共议题的杂志都没有，就令人咋异。没有杂志、期刊这类思辩和沟通的空间，根本不可能激荡起深刻的思想和观点，也无法发挥启蒙和影响的作用。

近年来，华社缺乏政治新论述，也跟华社陷入分裂和分化大有关系，不只大议题上有歧异，连许多小课题上都没有共识。如今华社对白小、数理科以英文教学的二四三方案、宏愿学校等华教课题都有分歧，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。其结果是华社内部的信任度和信赖感呈下滑趋势，进而导致华社内部的社会资本日益下降，体质越来越衰弱。

不过，我以为，90年代的华社缺乏创新论述，其中关键原因还在于，董教总已经缺乏论述的生产与更新的能力。过去10年，董教总的论述能力开始疲

软，在政治论述上失去昔日的创意性和爆发力。董教总不只在领导华人政治风向上，影响力渐渐削弱，即使是教育课题上的论述，也有停滞的现象。例如，在二四三方案和宽中数理课本英化问题上，从董教总的回应能力显示，其在教育专业的论述上，已呈现不足，在吸收新颖理论和前沿知识上，需要迎头赶上之处甚多，否则在论述的说服力和权威性上就大打折扣。董总的科层组织日益庞大，专业分工越细，但是政治性与运动性却是下滑，未来除了应付日常性操作外，还应该强化其理论与研究人材，才能因应各种论述分析的拓展需要。

但是，这种缺乏论述的窘境，不只是华团和民间力量独有，而是华人政治

整体的现象。华社民间社会没有新论述，行动党也没有新论述，马华公会的政治思考能力之低弱就更不必说，早已经是长年陷入论述萎靡状态。如今，华人政治论述几乎已达到总体溃散的程度，导致华裔公民渐渐成为国家政治的旁观者，面对回教政治抬头和马来人政治思变的风起云涌，竟然充满无力感。作家董桥说：“中年是下午茶”，其实当下的华人政治也有这种更年期心态——即使前程仍有可为，但是心情却是百无聊赖。如果华社越来越无关政治，并不活在本国的政治以内，反而热衷讨论台海问题、成立“一中促进会”，那么日子越久，真担心马来西亚华人有可能成为一个非政治的民族。